

# 考古实证中国八千年龙文化

## ——新石器时代龙形象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考古博物馆



▲ 翁牛特旗博物馆藏“C”形玉龙

▲ 浙江杭州官井头遗址出土玉龙首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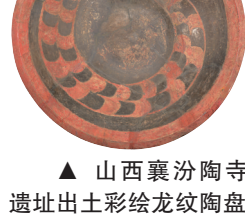
▲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龙



▲ 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猪龙



▲ 浙江余杭北村遗址出土玉龙首镯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龙纹陶盘

龙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影响深远而广泛。长久以来，龙在中国人的心中有吉祥、权威、力量等多种含义。考古研究发现表明，中国龙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众多与龙相关的遗存，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实物发现为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鲜明的物证。2024 甲辰龙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的统一部署下，中国考古博物馆联合 23 家考古文博单位，举办“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以考古实证阐释了古代中国龙形象、内涵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 距今 8000 年前后龙形象的起源

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已基于自身熟悉的动物形象创造龙的形象，体现出了独特的审美与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兴隆洼文化遗址。兴隆洼文化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上限为距今约 8200 年，奠定了西辽河流域在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地位。其遗址包括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及兴隆沟、克什克腾旗南台子、林西白音长汗、阜新查海等。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是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在祭祀坑 H35 中发现的猪首“S”形遗迹，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似且具祭祀意义，是辽西地区最早的猪首龙原始形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龙形堆石，位于聚落的中部，通长 19.7 米，其南侧分布墓葬和祭祀坑，推测为重要崇拜祭祀性神祇。

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的与龙有关且具祭祀性质的遗迹表明，辽西地区远古先民在距今 8000 年前后对龙的崇拜已具图腾崇拜含义，崇拜形象由某些动物实体向抽象化转变。兴隆洼文化时期是龙文化的孕育期。

### 距今 5000 年前后龙形象的发展

中国农业起源可追溯至万年前，经历漫长的 发展，至距今 7000 年前后，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业已形成。农作物播种的时间是否准确决定了 收成的丰歉，观象授时在农耕文化中尤为重要，作为星象的龙与农时产生了密切联系。

**赵宝沟文化** 兴隆洼文化结束之后，赵宝沟文化在辽西地区兴起。从房屋形制、聚落布局及出土遗物的特征看，赵宝沟文化是在直接承继兴隆洼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年代约为距今 7000~6400 年。尊形器是赵宝沟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在极少数尊形器的腹部刻划有复杂的动物纹饰。小山遗址出土的尊形器腹部刻划鸟兽纹饰，主体是鹿、猪、鸟的侧视形象。其中猪的形象用写实手法表现头部的长吻和獠牙，身体则为抽象的“S”形卷曲状，在头部和身体的接合处还刻划出向后飘逸的鬃鬣，形象逼真，应为辽西地区猪首龙形象成熟的标志。以小山尊形器为代表，赵宝沟文化先民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先民对于动物崇拜的传统，并将其抽象化、图案化，崇拜野猪的习俗得到升华。将猪首龙的形象刻划在祭祀用的陶器上，是辽西地区龙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为红山文化时期玉猪龙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 5500~5000 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出现了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巨型聚落中心和祭祀中心，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

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红山文化龙形玉器根据造型特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C”形玉龙，其造型具有典型的地域和时代风格，昂首，弯背，卷尾，整体造型呈“C”形，穿孔位于龙体中部；另一类是玉

猪龙，体卷曲如环形，尾端漫收，头、尾明显分开、相距甚近或连接，头部较大，双耳竖立，眼、嘴、鼻线条清晰，双目圆睁，吻部前凸，有明显褶皱，嘴张开或闭拢。从造型特征和使用功能看，红山文化玉猪龙同兴隆洼文化早期“龙”文化因素和赵宝沟文化刻划而成的猪首龙形象一脉相承，对商周及后期玉龙的雕琢和崇龙礼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红山文化玉龙的出现为标志，辽西地区龙文化的发展走向成熟。

龙是宗教祭祀发达的产物。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祭祀典礼的内容以祭天地、神灵、祖灵为主。张光直认为，中国上古宇宙观是把世界分为天、地、神、人等不同层次，并以巫者沟通天、地、神的活动作为宗教祭祀的主要内容，各类动物就是沟通天地的助手。红山文化各种动物题材的玉器，应是巫者通神的工具。从这个角度分析，红山文化玉龙的出现，应是红山文化晚期宗教祭祀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辽西地区龙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与远古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活动应该是红山文化先民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红山文化玉龙的出现应与辽西地区早作农业的发展及相应的祈雨活动紧密相关。

**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文化距今 5800~5300 年，因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发掘而得名。1998 年，考古工作者于凌家滩遗址 M16 中挖掘出一件玉龙。该玉龙身体呈环形，首尾相互连接，头顶部有明显的双角，背部高高隆起形成脊状，脊上刻有均匀分布的短斜线纹，并且靠近尾端处有一个小孔。其造型独特，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存在明显差异。2022 年，考古人员在凌家滩遗址有了新的发现，一件玉龙首形器得以重见天日。这件器物的头部形似猪首，在这一点上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相近之处，然而其尾端呈尖锐状。这种造型的玉器在凌家滩文化中还是首次出现，为深入探究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历程，提供了全新且极具价值的考古实证依据。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距今 5300~4300 年，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是长江下游地区

和长排柱坑，大体沿中轴线展开。

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据此认为，禹会村遗址是龙山时代以祭祀功能为主体的礼仪活动场所，遗迹和遗物所表现出的特殊性，与古史传说中的“禹会诸侯”事件相吻合。

### 淮河流域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

而龙山文化城址在遗址南部的发现，则让我们看到了更全面的遗址面貌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由于淮河的摆动侵蚀，西城垣被完全冲毁，北城垣和南城垣也被部分破坏。现存北城垣长约 270 米，东城垣保存较好，长约 625 米，面积至少 18 万平方米。

城垣依托自然岗地而建，为“两壕夹一垣”的形态特征，外壕浅而平缓，内壕深而狭窄，最初为堆筑城垣取土形成，后期发挥了排水功能。城垣底部宽 20~30 米不等。

城垣走向应该有特殊规划，已经发现的城垣东北、东南角都近乎直角，顺应了禹会村自然岗地的走向。

陶器标本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测年范围在距今 4350~4050 年之间。

上述“大型礼仪性建筑台基”位于东城垣北部，属于东城垣的一部分。

大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大会诸侯？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可能是根本原因。

### 大禹与涂山氏国

淮河从荆、涂二山之间穿过，淮河以北是

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玉器上多见有神人兽面纹，与之共出的还有一类纹样——龙首纹，在反山、瑶山玉器中有不少数量。这类图像无论正视还是侧视，都明确地显示了中国古代“龙”的特征。此外还发现有单体的玉龙，良渚遗址群官井头、余杭后头山、海宁皇坟头、海盐仙坛庙、昆山赵陵山等遗址均有出土，数量不多，分布地域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良渚遗址群及邻近区域，年代在松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值得注意的是，玉龙的形态与远在上千公里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雕龙较为接近，可能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着远程区域之间的“上层交流网”。

结合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大量龙首纹和龙首图案玉器，能够明确良渚遗址群是玉龙的重要出土地点。在这里，图像实现了从具象玉龙到图案化龙首纹的演变。进入良渚文化中晚期，玉龙的基本构成融入兽面纹之中，反映了该地区的原始宗教和信仰。

**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距今 4300~3900 年，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遗址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也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彩绘龙纹陶盘是陶寺文化龙文物的代表。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有 4 座大墓中各出土 1 件彩绘龙纹陶盘，该类陶盘应该为祭祀用器。彩绘龙纹陶盘出土于大墓，结合陶寺遗址“最初中国”的考古背景，其图案被认为是早期象征王权的龙形象，这表明龙在当时可能与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权力结构相关联，体现了人们对王权的敬畏和崇拜。此外，龙口中衔着似禾苗的枝状物，鉴于陶寺文化处于比较发达的史前农业经济阶段，当时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包括粟、稻和大豆等，这也体现了陶寺先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丰收的渴望。他们相信龙具有掌控自然气候、影响农作物生长的超自然力量，将龙作为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象征。《周易·乾卦·文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陶寺彩绘龙纹口衔禾苗的形象，反映了龙文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深刻联系，是文明肇始的生动诠释。

综上，考古视野下新石器时代龙形象的起源与发展大致分为距今 8000 年前后龙形象的起源和距今 5000 年前后龙形象的发展两大阶段。从 8000 年前后龙形象的起源来看，龙最初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远古先民将龙视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其能够掌控风雨、山川等自然元素。在祭祀活动中，龙形象可能是沟通人与神灵的媒介，人们通过对龙的崇拜和祭祀来祈求神灵的庇佑和恩赐。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在不同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始终是与神灵、祖先崇拜等相关联的重要元素。龙与政治权力的联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强。从红山文化玉龙可能象征着社会上层权力开始，到陶寺文化早期象征王权的龙形象，龙与社会统治阶层和权力结构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

龙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龙所代表的吉祥、权威、力量等含义，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龙文化融合了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在文学、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体现。8000 年来，龙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文化传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特身份的重要标志。

（执笔：刘国祥 陈春婷 赵思旻 黄一哲 陈昊雯 岳天懿 贾明浩）

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以南则是连绵起伏的江淮丘陵。荆、涂二山成为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重要地标。禹会村龙山文化核心区大型礼仪性建筑，祭祀活动相关设施及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会盟政治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当时淮河流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以稻作、渔猎为主体相对发达的业经济，也为涂山会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支撑。

考古调查发现，淮河流域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出现了聚落数量剧增、聚落间等级分化等现象。禹会村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龙山时代一个以禹会大规模区域中心聚落为核心的早期区域性国家面貌，印证了文献中古涂山氏国（一说古当涂国）的客观存在。

随着聚落考古的深入，新的考古成果还将向我们展现更加生动的社会场景。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禹会村遗址大型礼仪性建筑台基及相关遗迹

瓦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通常铺设在坡屋顶上，兼具排水、防漏及保护木架等多重功能。瓦的使用场景广泛，涵盖了宫殿、庙宇、寺庙以及民居等各类建筑。瓦的制作通常以当地粘土或泥土为原料，经过加工制坯并烧制而成。目前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最早使用陶瓦的历史可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而自西周以来，陶瓦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建筑材料，并在建筑屋顶中得到了应用。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 1 公里的西头村，地处渭北地区典型的台塬地貌，紧邻张洪塬的西侧边缘。遗址西、北两侧为百子沟及小型冲沟，东、南两侧为张洪塬，西南方向距泾河约 5 公里。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涵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周、西周、汉唐及明清时期的遗存，以西周时期的遗存最为显著。2022 年，新开掘的斜圳地点位于遗址西北部，发掘面积达 363 平方米。此次考古工作中共清理的遗迹包括房址 2 处、灰沟 2 条、踩路面 1 处、灰坑 36 个及冶炼坑 6 个，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瓦，为研究当时的工艺技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制瓦工艺流程中，原料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瓦的质量与性能。瓦的原料主要由粘土和屨和料构成。其中粘土通常就近取材，屨和料则包括矿物质类砂砾、植物类炭末、动物类蚌壳末等。屨和料的合理添加不仅可以改善粘土的物理性能，还能增强陶土的可塑性。此外，科技检测与分析在研究古代陶瓦制作工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科技检测手段，可以深入分析原料成分、加工方式及其对成品质量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古代陶瓦的制作技术与工艺特点。

### 样品和测试方法

#### 样品基本信息

本文从陶瓦件中抽取测试样品共计 22 件，其中 11 件来自地层堆积，10 件出土于遗迹单位。样品主要由灰陶、黄褐陶、褐陶构成。样品的切面厚度介于 0.86 厘米至 1.49 厘米。灰陶表面较粗糙，常见气孔，具有平行或弯曲排列的绳纹；黄褐陶和褐陶表面粗糙，气孔明显，纹饰深浅不一比较突出，偶见自然风化痕迹。样品中均未见明显分层。

#### 测试设备及仪器参数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 本文使用的仪器是日本岛津制作所生产的 XRF-1800 型 X 射线荧光光谱仪。主要规格及技术指标：铽靶 (Rh)，电压 60KV (Max)，管压 150mA (Max)，检测元素范围 19F~92U，检测浓度范围 10<sup>-6</sup>~100%，最小分析微区直径 250μm。为了明确陶瓦片本体组成，进行荧光分析时测试点均为超景深观察中的裸露新鲜断面，测试区域能充分代表该陶瓦片胎体特征与元素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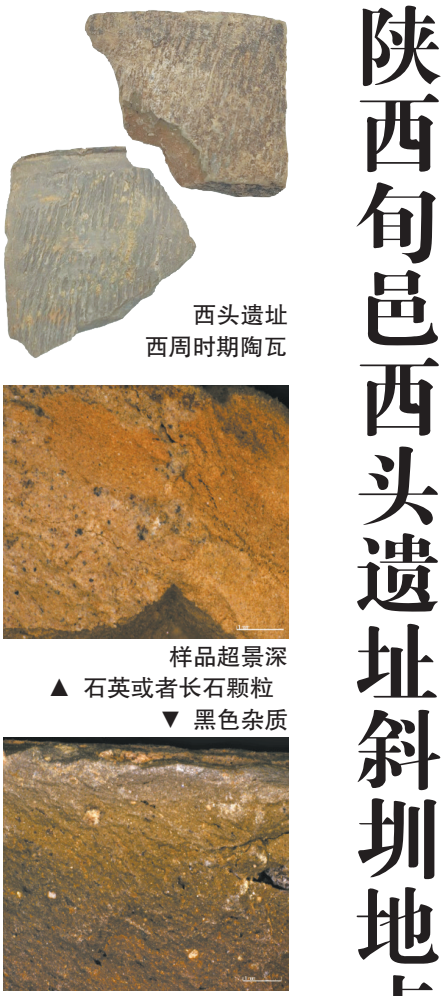
**超景深显微镜分析** 本文使用的仪器是德国蔡司公司生产的 SmartZoom5 高分辨多角度超景深显微镜，主要规格及技术指标：分辨率 1μm，放大倍率 34x~1011x，载物台尺寸 300×200mm。采用超景深显微镜对观察样品的微观结构，观察前先确认观察部位能够体现陶瓦片综合特征，将该部位先用毛刷清理表层，以至无污染物，之后用脱脂棉蘸无水乙醇进行擦拭。观察本体特征需要对陶片局部截断，裸露新鲜断面，裸露断面约 25 平方毫米观察实验后可重新拼接，实验放大倍数根据样品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 结果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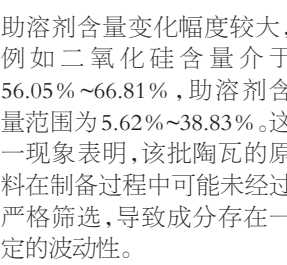
#### 荧光分析

陶胎的化学组成主要有 SiO<sub>2</sub>、Al<sub>2</sub>O<sub>3</sub>、FeO、Fe<sub>2</sub>O<sub>3</sub>、CaO、MgO、K<sub>2</sub>O、Na<sub>2</sub>O、TiO<sub>2</sub>、MnO 等。这些氧化物可分三类：第一类是 SiO<sub>2</sub>，作为主要成分；第二类是 Al<sub>2</sub>O<sub>3</sub>，其作用在于增强耐火性能；第三类包括 FeO、Fe<sub>2</sub>O<sub>3</sub>、CaO、MgO、K<sub>2</sub>O、Na<sub>2</sub>O、TiO<sub>2</sub>、MnO 等，统称为 R<sub>2</sub>O<sub>x</sub>，其中 R 指 Fe<sup>2+</sup>、Fe<sup>3+</sup>、Ca、Mg、K、Na、Ti、Mn 等金属离子，O 指氧元素，x、y 指原子数。在 R<sub>2</sub>O<sub>x</sub> 组分中，FeO、Fe<sub>2</sub>O<sub>3</sub>、CaO、MgO、K<sub>2</sub>O、Na<sub>2</sub>O、TiO<sub>2</sub> 作为主要助熔剂，其中碱金属 K<sub>2</sub>O、Na<sub>2</sub>O 和碱土金属 CaO、MgO 具有较强的助熔作用。这些助熔剂有助于陶器的烧结，然而，如果助熔剂含量过高，则会导致高温下陶胎熔融、软化甚至变形，即出现“烧流”现象，从而限制了陶器的最高烧成温度。由于烧成温度的限制，最终导致成品中的气孔较多。此外，FeO、Fe<sub>2</sub>O<sub>3</sub>、TiO<sub>2</sub>、MnO 具有着色作用，其中铁化合物对陶器烧成后的颜色影响最为显著，不同价态的铁 (Fe<sup>2+</sup> 和 Fe<sup>3+</sup>) 在不同的烧成气氛 (氧化或还原) 下，会呈现红色、黄色、棕色或黑色等不同色调，对陶器的外观特征具有重要影响。而陶胎中 SiO<sub>2</sub> 和 Al<sub>2</sub>O<sub>3</sub> 的含量可用于划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制陶所用的粘土类型。

对 22 件瓦片的 X 射线荧光光谱 (XRF) 检测显示，该批样品的主要成分为 SiO<sub>2</sub>，平均含量 61.67%；其次为 Al<sub>2</sub>O<sub>3</sub>，平均含量 20.50%。此外，还检测到少量的 FeO、K<sub>2</sub>O、MgO、CaO、TiO<sub>2</sub>、Na<sub>2</sub>O、P<sub>2</sub>O<sub>5</sub>、MnO、ZrO<sub>2</sub> 及 SO<sub>3</sub>，含量均在 0.1% 到 7% 之间。同时，样品中还含有微量元素，如 Ni、K、Ti、P、Mn、Cu、Na、Zr 及 S。该批陶瓦 SiO<sub>2</sub> 含量均低于 70%，Al<sub>2</sub>O<sub>3</sub> 含量范围在 12.40%~19.97% 之间。按照《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的分类标准，该批陶瓦具有普通易熔类粘土特征，这类粘土的第一个特征是 Al<sub>2</sub>O<sub>3</sub> 含量较高，第二个特征是碱金属氧化物和碱土金属氧化物含量较高，这两类氧化物有较强的助熔作用，从整体来看，该批陶瓦的主要化学成分较为一致，但是该批陶瓦的主要化学成分及



西头遗址西周时期陶瓦



样品超景深 ▲ 石英或者长石颗粒 ▼ 黑色杂质

助溶剂含量变化幅度较大，例如二氧化硅含量介于 56.05%~66.81%，助溶剂含量范围为 5.62%~38.83%。这一现象表明，该批陶瓦的原料在制备过程中可能未经过严格筛选，导致成分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 超景深分析

屨和料在制陶工艺中通常被称为瘠性原料，是在制备原料时有意识地加入的材料，其作用在于调整泥料的可塑性，提高成型能力，并改善烧结后的强度和稳定性。李文杰根据陶器中屨和料的不同，将其分为夹砂、夹云母、夹炭、夹蚌、夹陶末陶五种不同类型。本研究选取的样品采用超景深分析，对其断面结构特征进行观察，以分析其的结构组成、埋藏特性及腐蚀状况。结果表明，样品均属于夹砂陶。夹砂陶是在粘土中掺入矿物颗粒，以改善成型性能和烧结强度。由于砂砾的粒径不同，夹砂陶可进一步细分为多个类型。关于砂粒的粒级标准，1898 年伍登提出了一种以 2 为公比的等比粒级划分方法，最初用于风成沉积物的粒级分类。1922 年，温特沃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适用于松散沉积物及固结沉积岩，并形成了广泛应用于温特沃斯粒度分级标准 (表 1)。

本研究采用温特沃斯粒度分级标准，计算并归类样品中砂粒的平均粒径，最终识别出三种主要粒级类别：细砾 3 个、极粗砂 14 个、粗砂 5 个。分析结果表明，样品的颗粒分布较粗，且较小颗粒比例较低，表明原料在制备过程中可能未经过充分淘洗。

从成分上看，陶瓦中的夹砂颗粒主要由石英和长石颗粒组成。然而，还发现样品中存在较多杂质，主要以深灰色或黑色斑点的形式分布，集中分布于孔隙区域及颗粒表面。这些杂质可能来源于原料中的未充分净化矿物或埋藏环境中的腐蚀残留，杂质的存在可能促进孔隙扩展，从而材料的整体强度。在长期埋藏或使用过程中，孔隙中的水分和盐分反复渗透，会逐步削弱陶瓦的结构，最终导致其变得疏松，甚至出现粉化等物理损伤现象。

### 结论

西头遗址斜圳地点出土西周时期陶瓦，其原料主要为普通易熔类粘土，屨和料均为夹砂，其中砂砾以极粗砂为主，主要由石英和长石颗粒组成。

测试结果显示，该批陶瓦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助溶剂含量变化幅度较大，反映出原料在制备过程中未经过严格筛选。此外，屨和料中的砂砾颗粒分布较粗，较小颗粒比例较低，说明原料淘洗不够充分。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成品在成分上存在较大波动，显示出这批陶瓦的原料制备水平处于较初级的阶段。

尽管如此，制作者在陶土的采集与初步处理方面已积累一定技术经验，为后期更成熟、更标准化的制瓦工艺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细砾 (granule gravel)	2~4mm
极粗砂 (very coarse sand)	1~2mm
粗砂 (coarse sand)	1/2~1mm
中砂 (medium sand)	1/4~1/2mm
细砂 (fine sand)	1/8~1/4mm
极细砂 (very fine sand)	1/16~1/8mm

表 1

## 考古科普

# 大禹与涂山氏的美丽传说

叶润清

禹，后人尊称大禹，相传为夏后氏首领，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因治水患有被受舜禅让继帝位。大禹最卓越的功绩，是被后世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

涂山氏是古史传说中 大禹妻子的民族。“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夏之兴也以涂山”……在安徽，大禹与涂山氏的美丽传说家喻户晓。

而考古工作正在慢慢揭开大禹与涂山氏的历史面纱。

### 大型礼仪性建筑台基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位于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村遗址。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文物部门调查发现的一处遗址。考古工作表明，距今 7000 多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遗址北部定居生活，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规模剧增，总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

大型礼仪性建筑台基是禹会村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台基南北总长 108、北部东西宽 23.5、南部东西宽 13 米，总面积近 2000 平方米，整体上呈北宽南窄的倒梯形，是依托一座大型人工堆筑基址，经过人工开挖基槽、堆筑、铺垫和覆盖等多道程序建造起来的，自下而上逐层加工，共分三层，分别用灰土堆筑、黄土铺垫、白土覆盖。最上层开闢的白土面上，从北往南依次排列有柱洞、凹槽、烧祭面、方土台